

# 台北舊事

## 外交圈裡五十年之七

### ●定中明

#### 展現國格自立自強

一九五〇年民國卅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我由伊朗經香港抵達台灣，當時臺灣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戰後殘破的荒島，在基隆海港碼頭登陸後，第一個接觸到我眼簾的竟是一片「怎敢不低頭的矮簷」小屋，到了首善之區的台北市以後，所看到的，除了現仍存在的總統府大廈及其附近的台灣銀行、聯合大樓、最高法院、一女中校舍等幾座較具規模的建築而外，到處所見都是矮小木造的日式平房，馬路上的交通工具除了幾輛破舊的老爺公共汽車而外，很少看到自用小轎車，而遍街往來奔馳的都是青一色破舊的三輪車。

抵達台北後首先下榻位於中山北路一段的「錦江飯店」。不久遷入和平東路師範學院（師大前身）後面浦城街卅七巷廿八號自購的一所廿餘坪的「連建」小木屋中渡過四個半年頭。然後外放黎巴嫩，在這短短的幾年中世界局勢，國家大事，私人瑣事，都有值得一述。民國卅九年三月一日，蔣中正總統徇民意與情之請復行視事，中樞恢復了領導中心，民心士氣為之大振。唯台灣

地瘠民貧，百廢待舉。政府還在靠美援支持，所以軍民生活都非常艱苦，所幸全島同胞在政府正確卓越領導下，充份發揮了中華民族勤勞節儉的美德，以克難的精神，埋頭苦幹，胼手胝足，終於開創了一片新天地，經濟逐漸好轉，民生已能自立，民國五十二（一九六三）年自動要求美國停止經援，展現國格自立自強，最後竟創造出台灣「經濟奇蹟」，引起世人的矚目，國人引以為傲，奠定了今日台灣政經蓬勃發展的堅實基礎。

#### 錦江飯店巧遇親人

我們下榻台北中山北路錦江飯店的第二天傍晚，飯店內有人辦喜宴，賀客盈庭。我剛好因事外出，內子帶著四個孩子在房內守候，內子坐在窗前眺望，突然瞥見一位騎單車的男子下車後，把車停妥，掠過窗前進入大門，內子看見那人的面貌舉止，酷似她的胞弟萬萬柏，使她大為驚訝。但不敢確定，等我回來後她把情形告訴我，我也有點驚奇，立即跑到宴客的大廳去，向服務台的人員說要我一位客人，他問妥姓名後立刻寫了一張紙條上書「萬萬柏先生外找」，叫人拿進大

廳內高舉紙條，大聲呼叫，果然有人應聲而起，隨即快步出來，我便迎上去打招呼，他看見我後幾乎呆住了，那種驚愕之情，難以形容。我馬上引他到我們的房間來，姊弟久別，海外重逢，二人喜極而泣，然後坐下來傾訴離情，四個小外甥三女一男拉過來叫二舅，俗語說：「人親骨頭香」，孩子們似曾相識，一點也不怯生，我們都說：「做夢都沒想到會在台北邂逅。誠所謂：『踏破鐵鞋無處尋，得來全不費功夫』」，從此我們時相往來，心情上大感慰藉。內弟萬萬柏抗戰期間在重慶復旦大學唸經濟系，勝利後隨政府回南京入財政部工作，大陸淪陷前隨政府播遷來台，初在美援機構服務，嗣轉入國民黨營事業「中央製片廠」會計處任稽查，後昇主任。為人精明幹練，慷慨好義，交遊甚廣，因而感染煙酒、麻將等惡習，終罹患食道癌不治去逝，終身未婚，年僅四十八歲，英年早逝，各方至為惋惜，那時我們已調往西非茅尼塔利亞服務，未能參加其喪禮，僅三外甥女代為料理後事，至感遺憾。

#### 到外交部晤葉公超

筆者民國卅九年底攜眷投奔復興基地台灣的，主要目的就是重回外交部「歸建復職」，繼續為國效勞，那年蔣中正總統復職，政府改組，陳誠組閣任行政院長，外交部長一職由原任外部政次的葉公超博士真除，國際社會耳目一新。

我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三日上午前往延平北路外交部，外交部在一家原名「小春園」的茶樓舊址辦公，大門外掛著一塊「外交部」三個大字的木牌，那種落難蒙塵的寒倉景象，令人酸鼻。入門後打聽到亞西司的處所，見到了暫代司務的勾幫辦增啟，他是我亞西司重慶時代的老同事。乍見之下，驚喜交集，晤談片刻，他立即帶我去見葉公超部長，經過勾幫辦的簡略介紹，葉部長知道我的情況後，立即伸出大拇指連說：「了不起！我們這裏有人出走，潛往大陸，你竟歷盡艱辛，攜家帶眷投奔政府而來，真可謂『忠貞之士』，可敬可佩。我們非常歡迎你回來。」這時葉部長叫人把人事處長田方城叫來，略一介紹，即對他說：「你把你定中明列入『優先回部人員』的名冊中。說罷他起身走到辦公桌後面提筆寫了一封介紹信交給我說：『你去中國廣播公司找董事長張道藩，說罷，我立即告辭而出，原來葉部長考慮到在我回部以前我的生活問題，他介紹我去中廣開創『阿拉伯語節目』，由此可見葉部長腦筋靈活，設想週到，處事敏捷之一斑。」

### 主持中廣阿語節目

第二天我持函到和平東路盡頭的「中廣公司」舊址拜訪張董事長道藩，他接過信看完之後，

很和藹親切的對我說：定先生，我們非常歡迎你來為我們主持「阿語節目」，至於節目內容，時間安排等細節請你先去和節目部主任邱楠先生商談決定，我和邱主任商談的結果決定從民國四十年元旦起正式開播，這是中廣阿語節目的濫觴，直到現在依然存在。筆者先後主持該節目長達十餘年，每次外放，便找人接替。一旦調部又重回中廣再作馮婦，如是者三次，直到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我從利比亞以公使調部，自動宣佈除大使外不願再外放後，才又應中廣之邀，繼續主持節目，經獲公司同意，擴充編制，增加人手，充實內容，加強電力。而收聽率大增，無遠弗屆，中東、北非等地區的聽眾不斷來信，反映良好，真正發揮了宣傳功能，不再讓中共壟斷獨霸了。最後我請了兩位幹員，一位本國人（即現任政大阿語系的利傳田副教授），一位阿拉伯人負責編輯主編，我則僅每週撰寫（譯）社論或特稿三篇，後因兼任國立政大阿語系主任，以太忙而減為每週一篇，直到民國七十九（一九八〇）年十月因病住院，遵醫囑宜減少工作壓力，避免過勞，不得已乃忍痛辭去中廣兼職，告別中廣。

### 恢復回教協會會刊

穆斯林一回教徒每到一處定居下來，人數稍多，自然就會想到建立一所清真寺以為拜主（禮拜）聚會之所，中外皆然，民國卅八年大陸淪陷，隨政府播遷來台的教友，包括軍、公、教人員，民意代表、工商界人士為數頗多，起初大都集中在台北，而台北竟無一所清真寺，幸稍早有常

子春、鄭厚仁二位鄉老於民國卅六年先行來台創業，合資購得麗水街十七巷二號的一棟日式平房，後因眷屬未來，乃自動捐獻，權充臨時清真寺，（功在主道，求主回賜）這是台灣回教近代史上的第一座清真寺，在我接任以前已經有三位阿衡主持過該寺，他們是王靜齋、馬松亭、蕭永泰。王、馬二人不久都重回大陸。蕭永泰則因故辭職另立門戶，我到台北時正逢教長一席虛懸，於是教中耆宿元老會議決定聘請本人承乏，依照我國回教傳統由四位年高德劭之鄉老：時子周（國大代表）白健民（立法委員）康玉書（監察委員）常子萱（珠寶巨商兼任台北清真寺董事會董事長）枉駕寒舍當面致聘，在盛情難卻之下，祇有敬謹接受，但我預先聲明，我祇是兼任並非專任，我一旦外調，即請另聘高明，寺方完全同意。

我第一次在麗水街清真寺主持聚禮拜前的講話中就主張恢復「回教協會」的會刊，以為在教胞通訊聯絡，精神交流的工具，拜眾一致贊成。那天白崇禧（字健生）在場，拜後立即自動認捐，由白健生領頭慷慨捐新台幣一萬元以示範，接著常二爺子萱、鐵二爺寶亭等跟進，一次即募得新台幣數萬元，足以反映教胞對主道熱心之一斑，令人感佩，旋經回協常務理事會決議恢復「會刊」，以單頁四開小型報紙發行，公推謝松濤主編，初為不定期，嗣逐漸演變為季刊再進而成為今日之「雙月刊」，對於台灣伊斯蘭之宣教工作貢獻厥偉，功不可沒。

### 早出晚歸雖苦亦樂



①

① 作者定中明早年在紐約留影。

② 右起：作者定中明、傅允英、胡國材、凌楚珣早年在華府合影。



②

民國四十年六月下旬某日接獲外交部人事處的部令，通知已奉准復職，並自七月一日起回部上班，以專員名義分派在亞西司第三科，這自然是葉公超部長的特別安排，實踐他令我優先回部的諾言。

這時亞西司一共只有三人，計幫辦暫代司務勾增啟，一科科長蔡以典，科員孫福坤，我到司後發現蔡以典兼一三兩科科長，我的公文稿還須經他核轉，覺得有點彆扭，過幾天我去找人事處長田方城商談，我說：亞西司現有一三兩科，一科主管蘇聯（俄）三科主管中東，蔡以典是俄文專家管蘇俄事務自屬適宜，而三科是主管中東事務的以阿文為主，他對阿文及中東事務均甚陌生，我是專攻阿文及中東事務的，我的「東西」還要給他（蔡）過目，似乎有點不妥，您看要怎樣調整一下，方才妥適，他一聽心裏明白，便同意簽報部長改派我為第三科科長，部長立即批示「照准」，同時最令我詫異的是原來蔡以典也是專員名義暫代科長，經我這一「捅」才「原形畢露」，結果他沾了我的光，同時改升科長，分長一三兩科，而孫福坤則為兩科的共同科員，可見那時外交部人手缺乏的窘境。

我從此每天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後，還要趕寫廣播的資料，要加班一兩小時，才騎車到新公園中廣播室去錄音，等回家吃晚飯時都已經快九點鐘了，孩子們都早已入睡，有時早晨上班時天朗氣清，等到晚上回家時偶爾遇到風雨，渾身濕透，變成落湯雞，那種生活滋味回想起來，雖苦亦樂也。

## 我與白崇禧的交往

筆者生性耿介，不阿權貴，且富正義感，加以深受儒家思想及回教教義的雙重薰陶，養成了忠「君」（領袖）愛國的情操，擁護中央正統的志節，故在國家則始終尊崇蔣中正總統，堅貞不移，在宗教則敬重白崇禧將軍健公，終身不渝，我和健公的關係情誼，可分為三個階段，起初由疏而近，繼而由近而親，最後則由親而密，以至無話不談的程度，第一階段是在戰時首都重慶，那時健公身任軍訓部長兼副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為總長）同時兼任中國回教協會創辦人及首任理事長，為先總統所倚重，紅透了半邊天的人物，我那時剛進外交部，四年中始終沒有機會一見白健公（他受人包圍）直到民國卅四年底我初次外放伊朗才託健公機要秘書芳鄰王農村兄特別安排才得如願以償，晉見晤談時健公垂詢：「今後如何復興中國回教之道？」我即略抒管見，數陳理想，健公頗為欣賞，辭別時特別囑我寫一「書面報告」呈閱，我抵任後乃抽暇撰寫「上中國回教協會建議書」洋洋萬餘言，內容分十大項目，投郵航空，有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第二階段是從民國四十年至四十三年底我從伊朗返回台灣直到外放黎巴嫩，這期間健公已無公職在身，僅保留戰略顧問委員名義，他潛心研究教義，每週五必到麗水街清真寺參加聚禮，我們接觸的機會較多，彼此的瞭解也較深，第三階段為五十三（一九六四）年七月，我由駐西非茅利塔尼亞大使館代辦（因茅、中共建交）下旗歸國起直到五十

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健公突然歸真（無疾而終）為止，在這期間健公年事漸高，對人生意義，宗教真諦已有更深之領悟，承不棄不時約談，對教義多所垂詢，因而對筆者也有更深之認識與了解，五十六（一九六七）年中東「六日」之戰後，阿人慘敗，是年我朝覲團長人選，政府慎重遴選，以能表達對阿人慰問之情者為適宜，一時難產，健公大力推荐由筆者出任，乃不惜枉駕親自偕立法委員全道雲女士到舍間促駕，真誠感人，筆者乃首次擔任我國朝覲團長，首次晉見沙國費瑟國王，直接交談，結果至為圓滿，從此健公對我益加重，引為知己，無話不談，對我的建議，言聽計從，有一次我竟不揣冒昧地和健公談到他在大陸變色前，因李宗仁代總統主和，國共和談破裂，導致大陸淪陷所造成的健公與中央的一些誤會的問題來，這不僅影響健公的清譽，甚且有人想去國民大會中對健公提出彈劾案，一旦彈劾案成立，則對健公將至為不利，所幸蔣中正總統英明果斷，毅然宣佈：「大陸淪陷之過由中正一人負完全責任，與他人無關。」始化解此項政治危機，於是我乘機大膽地向白健公提出建議，我勸健公不妨效法「廉頗」的故事，親向蔣公中正「負荆請罪」，相信蔣公以仁者寬厚之胸襟，體念長官部屬之舊情，必能不究既往，一筆勾銷，果能如此，則不僅對健公個人有利，而且對全體教胞亦將有利，健公聽罷不但不以為忤，並從善如流，領首稱善，應允擬找一適當機會進行，可惜天不假年，健公竟於民國五十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凌晨，突然逝世，此

一歷史性之喜劇，未能上演，令人扼腕，然健公的清風亮節，一生對黨國的偉大貢獻將永垂青史，而最後能確保晚節尤令人敬佩。

## 中日恢復正常關係

中華民國近代史上最艱苦的一段時日要算八年對日抗戰了，我們用千萬人民的生命和無數的財產所換來的最後勝利，所付出的代價太昂貴了，太慘重了！然而我們所得到的卻是一場空。日本禍華無償地被赦免了，中共乘機佔領了大陸造成我中華民國今日如此的大災難，這筆血賬要向誰去算呢！向誰去討還呢！只有翹首問蒼天了！

按照國際慣例，日本既已向無條件投降之後，就應與我政府儘速簽訂「中日和約」，無如大陸淪陷，政府遷台，形勢大變狡黠成性的日本鬼子見有機可乘，乃故意一再拖延，而英蘇又暗中作梗，致使我未能參加一九五二年在舊金山舉行的盟國簽訂對日和約之會議，使局勢益加複雜，嗣經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居中協調，日本才於四月十一（一九五二）年二月廿日正式派遣河田烈為全權代表，前來台北與我方全權代表葉外長公超展開談判，其間因日方對和約名稱及適用範圍等多有異議，談判極為艱辛，經雙方一再磋商折衝，和約終於達成，於四月廿八日在台北簽字，同年八月五日生效，中日兩國始恢復正常關係。

## 韓戰義士投奔自由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北韓以秋風掃落葉之勢進攻南韓，漢城失守，情勢危殆，在此千

鈞一髮之際，美國麥克阿瑟元帥奉命統帥聯合國聯軍及時馳援，猛烈反攻，遏阻北韓攻勢，這時中共受蘇俄之慫恿，掀起瘋狂的「抗美援朝」運動，驅使百萬大軍，投入韓國戰場，充當炮灰，企圖以人海壓制聯軍的火海，戰況慘烈，鬼哭神嚎，所幸麥帥用兵神速，出奇制勝，仁川登陸、攔腰截擊，共軍腹背受敵，倉皇撤退，潰不成軍，舉手就擒，遂以北緯卅八度為界，就地停戰，舉行談判，其中最棘手之問題之一即為戰俘遣返問題，因為援朝共軍中有一萬四千二百餘人堅拒返回中國大陸，集體投奔自由，並表明志願回歸台灣自由祖國，聯軍統帥部乃宣佈，依照「日內瓦公約」及「韓戰停戰協定」之規定，中立區全部反共戰俘一律重獲自由，並交由我中華民國政府負責運回台灣，其首批義士於四十三（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三日乘輪抵達基隆，政府遂明訂是日為「一二三自由日」，每年舉行盛大慶祝。

當反共義士軍隊由基隆抵達台北市區進行英雄凱旋式的遊街活動時，市民萬人空巷，夾道歡呼，遍地響起一片砲竹聲，義士們身披紅綢綵帶，上書「反共勝利」，「投奔自由」，「中華民國萬歲」等標語，場面至為熱烈感人，隊伍行經重慶南路總統府前面時，我們外交部同仁都就近前往圍觀，那種熱烈興奮的情況，至今猶不時浮現腦際。值得一提的是這群反共義士之中有回教義士二百餘人，省籍遍全國，他們受到政府的週全照顧，中國回教協會曾派代表（筆者是其中之一）專誠到內湖營區去探視與慰問他們，並當面致贈毛巾、肥皂、牙刷、牙膏等日用品以資慰勞

·教胞相見互道「色蘭」，營區內洋溢著一片感人的溫馨氣氛，義士們後來均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分別受到政府的妥善照顧，或就業或入伍，各得其所，現已事隔四十年，義士們都早已退伍退休，因分散各地，平時少有聯絡，近況如何不得而知了。

## 中美邦誼益加密切

韓戰爆發後，戰況激烈，如火如荼，中共且已掀起，「反美援朝」運動，派大軍投入韓國戰場，這時杜魯門總統鑒於台灣海峽之敏感性，為防止中共之蠢動，維護此一地區之安全計，乃採取緊急措施，下令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並發表聲明，將「台灣中立化」，直到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就任後，向國會提出諸文，解除「台灣中立化」，並宣佈取消第七艦隊阻止我國軍對大陸「共軍」作戰之限制，但仍繼續協防台灣，惟我政府認為美國協防台灣一舉，乃基於美前總統杜魯門之緊急命令，並無法理上之拘束力，遂於是年十二月向美方提出建議，主張締結一項「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獲得美方之同意，經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與我外交部長葉公超之數度磋商後，終於達成協議，此一「共同防禦條約」遂於四十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在華府由杜、葉二氏代表中美雙方正式簽字，翌年十一月四日我立法院通過該約，三月三日杜勒斯來華訪問，在台北互換批准書正式生效，台海安全始獲進一步之保障，中美兩國邦誼，從此益加密切。（未完待續）